

1985年版电视剧《四世同堂》与原作小说的比较研究

— 以时代意识为中心

朴希亘*

<目 录>

1. 引言
2. 国家民族意识的强调
3. 知识分子的婚姻问题
4. 对传统家族制度与党派政治的看法
5. 结论

1. 引言

《四世同堂》是老舍着手于抗战时期、完成于抗战胜利后的一部长篇大作。这部小说以沦陷下的北平为背景，如实地表现了八年抗战期间中的北平人民生活。它在老舍的所有作品中的地位很高，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具有很重要的位置。

经典作品的特点是在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并且人们都会不停地阅读的。《四世同堂》正是如此，并且它还屡次被改编成多种多样的形式。《四世同堂》1985年被导演林汝为改编成28集电视连续剧，作为中国第一部大型连续剧，它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欢迎和批评界的好评。¹⁾ 《四世同堂》在九十年代没有

* 中國 北京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繫 博士研究生

1) 《胡乔木同志在会见〈四世同堂〉电视剧剧组时发表的讲话》（《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年鉴，1985-2002》）中将这部电视剧评定为“我国第一部大型优秀电视连续剧”。

被改编过，在2001年王新纪把它改编成北京曲剧，吴晓江导演。这是《四世同堂》第一次走向戏剧舞台的，而且采取了北京曲剧这样特殊的形式，这一版本虽然所引起的反应并不大，可是具有重要的意义。2009年汪俊导演再次拍摄《四世同堂》电视连续剧，篇幅比85年版长一些，共37集。这一版本播放当时引起了观众和评论界的注目，并受到了很大的欢迎。2010年田沁鑫导演把《四世同堂》改编成话剧，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985年版电视剧《四世同堂》共28集，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录制。北京电视台1979年5月成立之后，根据当时广大观众对文艺节目的关注，认识到了高质量的，并且能够吸引观众的好节目的必要性。导演林汝为决定把老舍的《四世同堂》改编成长篇电视剧，1983年该电视台的局党组将拍摄《四世同堂》电视剧的工作定为全局三大工作任务之一。²⁾林汝为（执笔）、李翔、牛星丽编剧。林汝为总导演，史可夫、蔡洪德、史宪副导演，梁世龙、邢培修、王晓辉摄像。85年版《四世同堂》起用了郑邦玉、李维康、李婉芬等著名演员。这些扮演主要人物的演员大部分是北京或天津地区出身，他们在表演上能够完整地体现出像老舍的原作一样的北京特色，因此85年版一直被称为“京味儿”最浓厚的版本。

《四世同堂》电视剧拍摄后1985年8月16日至9月9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创作集体获广播电影电视部授予的特别奖，作品获第六届（1985年度）全国优秀电视剧飞天奖连续剧特别奖。该版本尤其忠于原作，细心地再现了小说中的细节，至今被称为经典。

《四世同堂》原作小说发表的是从抗战时期到建国初期，而且它改编成电视剧的是在原作发表三十多年之后。原作和电视剧版出现的时代不同，因此在改编过程中必然会表现了改编当时——八十年代中期——的社会思想和时代特征。改编上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国家民族意识的强调、知识分子的婚姻问题，以及对传统家庭制度与党派政治的看法。本论文通过《四世同堂》原作小说和1985年版电视剧内容的比较，注重分析在1985年电视剧对原作的改编，试图探讨电视剧中的这些改编和当时时代思想的关系。

2) 可参阅赵正晶：《〈四世同堂〉播出的前前后后》，《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6年。

2. 国家民族意识的强调

1980年播出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后³⁾，播放电视剧《四世同堂》的1985年还是中国电视连续剧的初步阶段。85年版电视剧《四世同堂》是中国第一部大型电视连续剧，将著名的长篇小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的确是很大的工作。改编当时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才十多年，这时候谈到抗战问题还是比较复杂，要考虑的方面也很多。再加上改革开放不久的当时社会思想和气氛，该版本中表现了对原作的一些独特的解读与改编。

首先，在85年版电视剧中有意强调了很多出场人物的国家民族意识。在电视剧中，几乎在每一个场面有意显示和强调出场人物的爱国意识，同时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败类进行严厉的批判。老舍的原作本来就是注重表现了抗战时期北平人的爱国精神，可是在电视剧中为了强调这一方面特意增加了很多场面和台词。例如，第一集中瑞全在学校和牛教授对话：

祁瑞全：牛教授，学校停课啦。

牛教授：我知道了。哎，瑞全。

祁瑞全：啊？

牛教授：听说你的毕业论文写的不错呀。我可以看看吗？

祁瑞全：牛教授，本来有几个问题我要去请教您的，可是现在我写不下去了。

牛教授：为什么？

祁瑞全：我们的二十九军在卢沟桥和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我想……我想我们不应该在家里。

牛教授：那是他们军人的事。你们马上就要拿到文凭了，可不能半途而废啊。⁴⁾

3) “1980年2月5日晚，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敌营十八年》。让那时的人们感到新奇的是，这部电视剧一播就是九集。事实上，该剧是中国内地第一部电视连续剧。”（马卫：《国产电视剧从“零”飙至“称霸世界”》，《法制晚报》，2008年3月21日。）

4) 《四世同堂：二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音像出版社，1985年版，第一集。这一版本目前为止没有正式出版的剧本，以下的引用文章一律是笔者从电视剧上的字幕记录下

接着，瑞全在学校停课还是偷偷地从家里出来去学校看到日本军人抢学校里的书，并威胁学生们。这时候，一个女学生对周围的同学们说：“同胞们，团结起来！我们坚决去抗日！同胞们！团结起来坚决不做亡国奴！同胞们，我们是中国人！同胞们，同胞们！上西山，打游击去！誓死不做亡国奴！同胞们，团结起来！”日本军人把她拉走，瑞全看着敌人的这种行为非常愤怒。这两个细节都是在改编过程中所增加的。在瑞全和牛教授的对话中，通过两个人对战争的看法上的对立表现了瑞全的爱国意识与牛教授的自私的性格。瑞全觉得在卢沟桥爆发的战争对自己来说也很重要，并认为自己也应该关心这场战争。可是牛教授觉得“那是他们军人的事”，他自己只关心学问和文凭。在日本军人威胁学生们的场面强调了北平人的苦难以及他们对敌人的反感，同时通过瑞全面对着敌兵的愤怒表现了青年瑞全的强烈的爱国意识。

有一些细节通过在沦陷情况下民族的屈辱强调当时北平人感到的“亡国惨”，如商人来到胡同里卖日本国旗的细节等。而且，一些人物在小说中并不具有明确的国家民族概念，可是在电视剧中表现了这些人物的国家概念与对当时情况的理解。例如，上海沦陷后天佑在路上碰到一个卖号外的小孩子，他听这个孩子叫“号外”，说：“号外？这是殃榜！”祁老人、祁天佑和韵梅等人听到了各地沦陷的消息后的反应都表现着他们的国家民族意识。瑞丰参加庆祝保定陷落的游行后带着日本人给他的糖回家，要给妞子那些糖的时候，韵梅拒接收他的糖说：“妞妞，你听妈的话，咱不吃日本糖！”这样的细节是在小说中没有的，剧中为了强调普通百姓对敌人的反感和他们的爱国意识增加了很多这样的细节。比较突出的是瑞丰当上伪政府的科长后祁老人的反应。他在小说中的反应和电视剧中的反应几乎完全相反：“祁老人和天佑太太听说瑞丰得了科长，喜欢的什么似的！”只是“及至听说二爷决定搬出去，老人们的眼中都发了一下黑。”⁵⁾他们因瑞丰的当官而非常高兴，只是因为瑞丰夫妇要搬出去，他们的“四世同堂”的生活受到了威胁，感到不安和不满。可是在电视剧中，祁老人听到瑞丰当了科长的消息，而且冠家人给他送了好多礼

来的。

5)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6-357页。

物后，瑞宣给他解释瑞丰的行动是什么意思，祁老人也完全明白瑞丰的行动不对：

韵梅：爷爷，您瞧。这是怎么话儿说的？

祁老人：老大，你为什么就不出来呢？多得罪人呢！

祁瑞宣：爷爷，让我怎么跟您说呢？这算什么喜事儿？老二，他当汉奸了！

祁老人：这，老三打日本，老二当汉奸，这两个人，这笔帐，怎么算呢！

祁天佑：爸爸，这是谁家送来这么多东西呀？

祁老人：那院儿。

祁天佑：为什么？

祁老人：老二当了汉奸了！比打我一顿嘴巴还寒碜！

祁天佑：爸爸，这都怨我没管教好啊！

（天佑到程长顺的家去找他）

祁天佑：长顺儿，你出来一下。

程长顺：哎。祁掌柜，您有事儿吗？

祁天佑：长顺儿，我有件事儿想求求你。

程长顺：您说吧。

祁天佑：冠家给我送了一些东西，你给我给他还回去。

程长顺：哎，哎。⁶⁾

他们的这种反应和小说中的叙述完全不同。在小说中，这一细节上天佑本来不在家，可是电视剧中他在家看到了这个事件后，把那些礼物都送回到冠家去。祁老人和祁天佑的这些对话与行动都显示着他们的国家民族意识。在小说中，只有瑞宣责备老二当了汉奸，要求他拒绝科长的职位；可是电视剧中祁老人和天佑都明白老二当科长是当了汉奸，而且对此感到强烈的反感。

剧中还有一些细节上表现了一般民众对敌人的反感，如冠家的大赤包和尤桐芳吵架的时候，尤桐芳对冠家人想巴结日本人的态度表现出明显的反感：

大赤包：小门小户照样出狐狸精，不招还往家钻呢。再招俩我养活的起吗？

尤桐芳：哟，大太太，谁是不招就钻进来的呀？

6) 《四世同堂：二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音像出版社，1985年版，第八集。

大赤包：谁钻谁知道，什么样的男人见了这号的小妖精也得给拐带坏了？再这么成天挨家守着小娘儿们，全家都得喝西北风！

尤桐芳：这年头，要能老老实实在家守着小娘儿们，喝了西北风也比给日本人拍马屁遛狗子强！

大赤包：你算什么东西，敢教训老娘！

尤桐芳：教训你怎么着？日本人占了北平，把你乐颠了馅儿了？你还有点儿中国人的样吗？……幸吧，我见过，日本人在东三省宰得还少哇！你是他妈日本人什么婊子！⁷⁾

她们的这场吵架，在小说中没有表现了她们之间的对话，只是简单地说明了尤桐芳为自己的老家辽宁辩护：“今天，她的责骂不仅是为她自己，而且是为了她的老家——辽宁。……她知道日本人骗去了她的老家，也晓得日本人是怎样虐待她的乡亲，所以她深恨大赤包的设尽方法想接近日本人。”⁸⁾剧中把她们的这场吵架表现得非常生动，显示了尤桐芳对大赤包的反感和对敌人的愤怒。还有保定陷落后，洋车夫小崔不想从挂着“庆祝保定陷落”气球的路拉车等等，电视剧中增加了很多这种场面，表现了北平人民对敌人和伪政府的反感。

这种反感有时是通过对反抗敌人的人物的赞扬表现的。尤桐芳从小崔口中听到钱仲石的事之后，回家告诉高第说：“一条命换一车人的命，值得！冲这个，高第，你真是没看错人啊！”通过桐芳和高第的对话表现了两个人对仲石的赞扬和她们与其他冠家人的不同见解。胡同里搬来了日本人后，有一天那家的两个日本孩子推倒了小顺儿，韵梅阻止那些日本孩子。在这一细节上，小说中只描写了祁老人担心韵梅得罪敌人说：“小顺儿的妈惹了祸喽！”但瑞宣却因韵梅的行动而高兴。可是在电视剧中四大妈、孙七和长顺等胡同的邻居们都到祁家来称赞韵梅的勇气。长顺说：“您给咱们胡同的这些好人出了气！”剧中增加的这些细节都表现了胡同里大多数居民的爱国心。

对出场人物的国家民族意识的这些处理，与改编当时（八十年代中期）的社会哲学与思想有关。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在社会哲学方面有过几次大讨论—

7) 同上，第三集。

8)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一即“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生活方式”、“文化热”、“主体性讨论”等。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过程中，关于“主体性”的思考表现为民族主体性问题，而且民族主体性问题与民族主权和国家主权问题有密切的关系。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强调国家主权意识，当时他的国家主权意识主要是针对港澳台问题的。“国家领土完整是国家主权的最主要标志”¹⁰⁾，这样强调国家主权与国家领土完整的社会背景下，在改编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社会思想的影响。况且《四世同堂》原作小说叙述的正是中国曾经丢失过一部分地区主权的抗战时期的内容，这样的内容与当时社会氛围之间形成一定意义上的共通性，而且这种共通性也会影响到了编剧过程。

在这一问题上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中日关系问题。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自从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至1989年是中日关系上的所谓“蜜月期”。在这一时期中，邓小平为了互换《和平友好条约》而访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日的。¹¹⁾邓小平的访日开启了中日关系的新局面。他的访日后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也访问中国，逐渐开始了交流，在20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上进行了积极的交流。但这时期也出现过一些外交上的问题，如日本教科书问题和日本首相参拜神社的问题等。虽然当时中日关系正在所谓的“蜜月期”中，但是邓小平是对这些外交上的重要问题还是严肃对待的。¹²⁾在每一时期，中日关系上一直存在着这种“两重性”，中日关系总不能离开历史问题。八十年代，在世界方面冷战还没有完全结束，在中

9) 可参阅陶理清、杨克棋：《八十年代思想历程的回顾与启示》，《安徽农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10) 陈天宇：《邓小平爱国主义思想初探》，《附件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1)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二战后首次正式访问日本。这次访问，是为了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也是邓小平在酝酿中国现代化大战略的过程中所做的一次取经之旅。”（宋志勇：《从敌对关系到战略互惠的中日关系》，《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12) “新的现实促使邓小平对中日关系的两重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一方面，他认为要扎扎实实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相互了解；另一方面，对日本国内一小撮极右势力，他又时刻保持警惕，主张要‘加强批评、揭露’，‘不能软弱’，要‘妥善、及时处理遇到的问题’。”（董振瑞：《“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邓小平与1977-1989年的中日关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2012年。）

国方面，虽然抗战结束后已经过了40年，不过进行这次改编的八十年代中期与后面进行三次改编的各个时期相比，对中华民族来说战争的记忆还是活生生的，战争留下的伤痕还是很明显的时期。当时，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关系还在开始的阶段，中国人民对日本的认识与感情是很复杂的，改编中也会反映了社会中的这种认识与气氛。因此，在1985年版的电视剧中时常强调人物的爱国思想，通过爱国主义强调中国的国家主权与民族主体性意识。

该版本中的国家民族意识的强调，有时通过对英雄人物的歌颂和对汉奸败类的激烈的批判来表现。这些思想在小说中也是非常突出的，在电视剧中有意增加了很多场面，注重表现了爱国斗士与汉奸败类之间的强烈的对比。例如，日本人要请牛教授出任教育局局长的时候，在小说中钱先生只问过瑞宣是否认识牛教授，可是剧中添加了钱先生去牛教授家试图说服牛教授的场面：

钱默吟：您还能安心地搞学问？难道对咱们的国家您就……。

牛教授：科学是没有国籍的！科学是……。

钱先生：可是您这个人是有国籍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

牛教授：那么，都得像您一样吗？您是诗人，可却让您的儿子去翻汽车，杀人，搞得家破人亡！我不准别人打搅我，把我也卷进政治的漩涡！

钱先生：可是政治正在敲您的大门！日本人想清楚了，他们光找些流氓是不能征服中国人的。所以他们才请您，利用您在国际国内的声望招来更多的软骨头！

牛教授：我更珍惜的是时间和安静。您请便吧！

钱先生：好，我可以走。不过，我还是要奉劝您！您，一个中国人，不能光有理智，没有感情；不能光有学问，没有人格！¹³⁾

在小说中，关于牛教授的这种性格只是进行了很直接的叙述，这两个人物并没有见过一次面。可是在电视剧中有意增加了钱先生和牛教授之间的这样的对话，非常有效地表现了两个知识分子的不同性格以及两个人在国难面前采取的不同态度，以此造成了鲜明的对比。钱先生是一个倾向于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

13) 《四世同堂：二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音像出版社，1985年版，第十二集。

而且牛教授是典型的新知识分子。通过他们的对话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文化人”选择的不同道路。可是，不是所有的旧知识分子都爱国，也不是所有的新知识分子都会当汉奸。冠晓荷和钱先生一样，也属于传统的文化人，可是在国难当头他的选择却是成为最可恶的汉奸。同样，新知识分子里面也有像祁瑞全一样的爱国斗士。在抗战爆发之前，瑞全是快要大学毕业的学生，可是在他的祖国面临极大的危机时，他愤然选择放弃学习，直接为祖国行动的道路。到了抗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瑞全回到北平，在北平城内进行最后的抗日工作。在电视剧中有意增加了瑞全回到北平后找牛教授去要求他保护反对日本人的教师和学生的场面。在小说中，德国投降以后，有关牛教授的叙述只有他试图离开北平时被日本人发现而被捕下狱的内容。小说中瑞全回到北平后也没有找过牛教授。电视剧中增加的这一场面戏剧性特别强烈。已经完全变成汉奸的牛教授没有认出已经变成抗日斗士的祁瑞全。他们的对话里面没有说明战争爆发之前的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可是通过这一场面可以看出电视剧的第一集开头出现过的师生俩通过两种不同选择，经过八年时间后各自变成什么样的人物，并且这一场面还暗示了两个人会遇到什么样的结局。

除了这些直接的对比之外，85年版电视剧中还表现了一般人民对这些文化人的不同选择的看法和评价。当然，在小说中的小羊圈胡同的居民基本上都赞扬爱国斗士，批判汉奸败类，可是在电视剧中更加强了这样的评价。例如，电视剧中增加了祁瑞丰在一所茶馆里听方六和另一个艺人一起说相声的场面。方六是住在小羊圈胡同的一个大杂院里的说相声的艺人。小说中只说明过方六的职业，并没有出现过他说相声的场面或他所说的相声的内容。在电视剧中，有意增加了方六和别的艺人一起说相声的场面，并且特为此写了比较长的相声内容。说相声本来就带有讽刺色彩，可是在电视剧中的这一场相声中，说相声的两个人面前坐着一个汉奸败类祁瑞丰。他刚刚丢了差事，因此他的妻子要跟她离婚，而且跟别人再婚。他想死掉，可是他因为太害怕而没有成功，只好回家。回家的路上他喝酒喝醉了，进了一所茶馆，在那里方六和一个艺人说着相声，批评他，嘲笑他。方六可能还不知道瑞丰的详细情况，可是他们所说的内容是正面批判和嘲笑祁瑞丰

的。更重要的是，他们说的相声里面明明批判着“穿着大西服，一脸中日亲善的模样”的汉奸们的。剧中通过相声中的这种内容表现了一般人民对那些文化人所作出的选择的判断：他们赞扬钱先生和祁瑞宣等深爱国家的文化人，而且批判冠晓荷和祁瑞丰等为了自己的利益甘心出卖国家的另一种文化人。可以说这一场面增加得非常适当而且有效。

3. 知识分子的婚姻问题

在85年版电视剧针对原作小说进行的比较明显的改编之一，就是瑞宣和韵梅的关系上的变化。关于瑞宣和韵梅的关系，小说上有明确的说明：瑞宣“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他早已知道什么恋爱神圣，结婚自由那一套。可是他娶了父亲给他定下的韵梅。他知道不该把一辈子栓在个他所不爱的女人身上，但是他又不忍看祖父，父母的泪眼与愁容。”¹⁴⁾韵梅也知道丈夫不爱自己，可是不能理解瑞宣的心理。她只是尽力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一般不会对丈夫提问。瑞宣也基本上不会和韵梅谈起自己的心情或战争的情势等。在小说中，瑞宣在家里讨论国事的对象只有瑞全，他不告诉韵梅战争的情况和自己的内心。小说中的韵梅不能理解丈夫，觉得丈夫是一个“迷”，他们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在结婚以前，她就由娘家人的神色与低声的嘀咕中领会到她的未婚夫不大喜欢他。虽然心中反对自由结婚，她可是不能不承认现在的世界上确乎可以“自由”一下，而未婚夫的不喜欢她，或者正因为不“自由”！她认定了自己是毫无罪过的苦命人。……可是，她心中始终有点不大安逸，总觉得丈夫与她之间有那么一层薄纱，虽然不十分碍事，可是他们俩老因此而不能心贴着心的完全粘合在一处。……在思想上，言论上，合一部分行动上，瑞宣简直是她的一个永不可解的谜。¹⁵⁾

14)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15) 同上，250-251页。

可是这样的距离在电视剧中不太能感觉到。在电视剧中，他们互相了解，很少吵架，非常和睦。电视剧中瑞宣还经常告诉韵梅战争的情势，并且有时跟她说出自己的内心。在小说中，瑞宣在李四爷的帮助下让老三瑞全出城后，关于这件事他对家里的任何人都没有特别的解释。可是在电视剧中韵梅问他“老三到底哪儿去了？”瑞宣回答：“走了。”而且韵梅担心瑞全有没有“伴儿”。到了中秋节，瑞宣想念着瑞全拿毛笔写起苏轼的诗句，韵梅问他写什么，瑞宣给她解释：

韵梅：今儿他二叔和他二婶也没在家吃饭。你也不说陪着爷爷说会儿话去，这写什么呢？（靠近瑞宣看看他写的字）

祁瑞宣：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韵梅：婵娟？

祁瑞宣：在这儿当月亮讲。

韵梅：啊。你写这干什么呀？

祁瑞宣：这是苏东坡八月十五的时候想他弟弟写的。

韵梅：那你写吧，多写两张！¹⁶⁾

这是电视剧中有意增加的场面。小说中瑞宣没有写过这些诗句，电视剧中的瑞宣却写了诗句之后又一——给韵梅解释，而且韵梅也理解丈夫想念弟弟的心情，让他“多写两张”，把自己想念老三的心情也寄托在他的字上。

瑞宣受不了日本教官监视学校而辞职后，家庭经济上发生了困难。小说中是瑞宣自己想出英国大使馆的富善先生，可是电视剧中让韵梅找出富善先生曾经给瑞宣写的信，并劝他去找富善先生：

（韵梅看着信）

祁瑞宣：你怎么还不睡呀？你要再累着，我可就更有罪了。

韵梅：哎，这不是英国府富善先生给你的三封信吗？他不是说你要是有了难处可以去找他吗？

祁瑞宣：我不给日本人做事，也不想给英国人做事！

韵梅：这些我明白。我是想，他是你的老师，又是你的朋友，这不是一码子事

16) 《四世同堂：二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音像出版社，1985年版，第五集。

儿！

祁瑞宣：True friendship foresees the needs of others rather than proclaims its own.

韵梅：你说什么呢？

祁瑞宣：真正的朋友总是预见别人的需要，而不是提出自己的需要。

韵梅：是啊，那他给你的三封信不是就猜着你有困难了吗？¹⁷⁾

小说中的瑞宣肯定不会跟韵梅讲起什么英语句子来，可是剧中的瑞宣不仅跟她说英语，并且给她解释那句话的意思，而且最后接受她的建议去找富善先生。当然，瑞宣去找富善先生是小说中原有的内容，可是在电视剧中让韵梅提出这个办法，这样让瑞宣和韵梅夫妻之间多了一场对话，让他们交换意见，表现了他们之间和睦的关系。后来瑞全回到北京，瑞宣从明月和尚收到了瑞全给他写的信之后，瑞宣非常高兴，马上告诉韵梅瑞全回到北平的事：

瑞宣：韵梅，真让你给说着了，老三真的回来了！

韵梅：哟！那，什么时候到家呀？

瑞宣：他不回家！他约我下午两点钟在外头见面！

韵梅：那，那，我给他……。

瑞宣：韵梅呀，咱们可真没有白白的把他送走啊！他在外面一定作出不少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回总算能……能给不争气的老二，赎罪了！

韵梅：哎，瑞宣，你让他偷偷回来一趟！爷爷跟妈呀，都想死他了！

瑞宣：回家，他要是见不着爸爸……。（含着泪）他出去报国，我在家尽孝，可是我孝在哪儿啊！我没能保住爸爸，又不能替他报仇！我有什么脸面见老三呀！¹⁸⁾

在小说中，瑞宣只“想”告诉韵梅而已，并没有真的告诉她：“他想去告诉韵梅：‘你说对了，老三确实回来了！’他也想去告诉母亲，祖父，和邻居们：‘我们祁家的英雄回来了！’可是，他没有动。他必须替自家的英雄严守秘密。”¹⁹⁾可是在

17) 同上，第十二集。

18) 同上，第二十五集。

19)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9页。

电视剧中，瑞宣只有对妻子韵梅没有“严守秘密”，而告诉她她看得对，瑞全真的回来了。这样，剧中的瑞宣在很多细节中都和韵梅对话，跟她谈起自己的心情与想法，同时也参考她的建议。另外，还有一些场面中表现了瑞宣对韵梅的关心与体贴，例如韵梅去领共和面时受伤回家后瑞宣出去买药并亲自给她涂药的场面等。

老舍通过小说中的瑞宣与韵梅的婚姻生活来反映了民国以后许多新时代知识分子的不自愿婚姻。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新式的教育，接受了新的思想，可是为他们决定婚事的他们的长辈还是坚持着传统的封建思想。他们的长辈给他们找出的对象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他们只好和这样的妻子结婚，可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婚姻往往遭到很不幸的结果，例如鲁迅与茅盾的情况等。老舍是一个例外，他拒绝了他的母亲给他找的对象，而且和受到了新教育的女性胡絮青结婚，²⁰⁾可是他对当时的这种气氛必然会有很深刻的了解。作品中的瑞宣正是代表着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他的婚姻也自然代表着当时知识分子社会中普遍的婚姻状况。不过原作中瑞宣和韵梅的这种不合，在85年版电视剧中却没有表现出来，反而表现了非常和睦的夫妻关系。

这样的改编，可能与当时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与观点有关。“建国之后，随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确立与当代文学创作基调的定位”，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知识分子必须改造成为工农兵后才能进行创作；……即使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知识分子形象也要有工农兵形象的理想追求与人生追求。”²¹⁾“文革期间，知识分子形象被公然作为与无产阶级对立的一个阶层出现在文学创作中。”²¹⁾老舍创作《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的是1944年，他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状况。但是经历了建国和文革之后，1984年把它改编成电视剧时，整个社会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发生了极大地变化。工农兵形象已经在社会上和文学创作上成为正面形象，因此与工农兵形象对立的知识分子形象自然成为一个反面的，应当尽量避免或改造的形象。1985年版电视剧中肯定与强调人物的爱国意识的同时，也需要肯定工农兵

20) “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老舍：《我的母亲》，《老舍全集》第十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页。）

21) 惠雁冰：《身份体认的痛苦与迷乱——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末的较色定位》，《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3期。

形象，而且为了肯定工农兵形象，改编过程中选择了否定或忽略知识分子形象的主要性格特征的方式。瑞宣在小说中当初不愿意和韵梅结婚，后来无奈地和她结婚后也不怎么喜爱她，而且不告诉她自己心中的苦闷，这样的表现是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因此在电视剧中删除了这样的描写，反而添加了他们夫妻非常亲近和和睦的场面，这可以说是对小说中瑞宣的这种性格的否定。这样的改编方式是反映了改编当时——八十年代中期——的社会思想和氛围，但是可以说这样的改编忽视了民国时期的一种社会问题，即当时知识分子不自主的结婚以及不幸的婚姻生活的。

电视剧中特别强调胡同居民的爱国意识也可能是起因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在小说中，明确的爱国意识与“亡国惨”意识基本上是知识分子独有的思想，一般百姓对亡国的状况也有模糊的把握，可是他们并不像瑞宣、瑞全和钱先生等知识分子一样明白当时的情况。他们在电视剧中也不是完全理解中国的现状与命运，可是他们还是比小说中清晰得多，虽然不太懂，可是他们的爱国意识非常强烈。同时，电视剧中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这样的意识和态度往往表现支持与肯定。例如祁家人听到八一三上海抗战的消息后，韵梅看到大家很高兴的样子便建议吃饺子，说：“憋闷了这么些日子了，今儿才算透了点儿天儿。吃顿茴香陷饺子吧！”听她这样的建议，瑞全就称赞韵梅说：“大嫂，您真爱国！”而且很高兴地要帮她包饺子。知识分子形象对一般民众形象的这种肯定与支持，包括瑞宣对妻子韵梅的承认与肯定，也是反映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上工农兵形象成为社会的主人公和正面形象的社会现实。

4. 对传统家族制度与党派政治的看法

85年版电视剧对小说的改编还表现在该剧对传统家族制度的看法上。在电视剧中表现了对中国传统大家庭制度的批判意识，这样的思想表现得最明显的是瑞

全回到北平后去找钱先生进行对话的细节。在小说上，他们的对话中只谈了两个人在抗战期间的经历、小羊圈胡同居民身上的变化，以及钱先生建议瑞全跟自己合作的事情。可是电视剧中的这一细节上增加了一项内容，就是瑞全对大哥瑞宣的“四世同堂的态度”的批判。

祁瑞全：我见过黄河的野浪，扬子江的风帆，三峡的惊涛，见过乱山中，连茶叶都没见过的三家村，更见过黄土高原的风雨春秋！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见过旧的中国怎样在消亡，而新的中国……。

钱默吟：对，对呀！你大哥曾经和我说过，旧的历史随着它的诗、画，与君子小人，必须死去！而新的历史必须由血里产生！血里边哪！

祁瑞全：（高兴）是吗？这是我大哥说的？这么说，他也永远不会再保持和维护那种旧的四世同堂的生活状态了！

钱默吟：是啊，他也曾经惶惑过，也想偷生下去，可是这场战争彻底教训了他呀！他现在是在不断地追索啊！

祁瑞全：追索……。22)

其实瑞宣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在电视剧中，并没有跟钱先生说过那些话。在这里钱先生引用的是小说中瑞宣看着被释放回来的钱先生产生的思想：

老人的痛苦像是一种警告：“你别忘了敌人的狠毒！”老人的哀鸣与各处的炮火仿佛是相配合的两种呼声：“旧的历史，带着它的诗，画，与君子人，必须死！新的历史必须由血里产生出来！”这种警告语呼声并不能使他像老三似的马上逃出北平，可是消极的，他能因此而更咬紧一点牙，在无可如何之中不至于丧失了节操。23)

这些话本来是瑞宣自己想象的而已，并不是他对钱先生说的话。在剧中的这一场面上，钱先生提到的他自己和瑞宣的对话就是瑞宣被捕下狱再回来后两个人在茶馆里进行的对话。当时钱先生提到过一些“民族的遗传病”——“我们的传统的升

22) 《四世同堂：二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音像出版社，1985年版，第二十五集。

23)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官发财的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²⁴⁾等等。瑞宣听了钱先生的话之后自己不断思索，决定不要逃避，而正视现实。通过钱先生的对话，瑞宣确实有了这样的觉悟，可是他没有说过“新的历史必须由血里产生”等等的话。这句话，瑞宣没有跟任何人说过，电视剧中也没有提到瑞宣的这种思想，可是钱先生在和小说完全不同的场合上突然跟瑞全说出这样的话。

小说中，老舍注重表现的并不是传统家庭内部的矛盾，而是外在的压力对大家庭生存的威胁。老舍笔下的祁家大体上很和睦，四世同堂的大部分成员都互相爱护，体贴。除了瑞丰夫妇这两个民族败类在国家和家庭所遇到的灾难中只顾自身的利益而分家之外，在祁家的成员之间并没有发生深刻的矛盾和冲突。不难看出，老舍笔下的传统大家庭不是像其他现代作家作品中的封建家庭那样充满矛盾的形象。祁家里当然也有矛盾，可是引起那些矛盾的并不是长辈对晚辈的专制和压抑，而是家庭成员对灾难情况的不同见解，即家庭外在的压力。

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家庭制度和封建家长制度在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²⁵⁾这样的批判在五四时期达到了高峰，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作品反映了对传统家庭制度的这种批判。可是从三十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对传统家庭的不同看法和叙述。在文学作品中，传统大家庭不再是必须要批判的对象，而是一种眷恋的对象。“在三十年代后期的家庭叙事中，四世同堂式的家庭成员之间已不完全是等级森严般的冷漠，也有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家族亲情，正是这种道德感情才使祁家虽历经八年战争的蹂躏仍得以保持”。²⁶⁾随着时代和思想的流变，作家们对传统大家庭已不持有像从前一样的严厉批判的态度（连最激烈地批判传统家庭和封建家长制度的巴金等作家也是），老舍在《四世同堂》里面对祁家四世同堂和祁老人等家长形象的叙述一方面反映了时代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作

24)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9页。

25) 可参阅孟宪范：《家庭：百年来的三次冲击及我们的选择》，《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26) 曹书文：《旧家的解体与灵魂的归依——抗战时期家族文学新论》，《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家自身的情感与思想，一方面还反映了抗战时期整个国家面对极大危机的情况下家庭这一社会的最小单位的凝聚力。可是，这部小说创作于抗战时期，但改编于80年代中期。小说从发表到改编的30多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解放和文革等巨大事件，这样的过程中中国的家庭制度和家庭伦理上发生了很多变化，因此改编后的版本必然反映着时代和社会的这些变化。文革结束后国家发布了《宪法》、《婚姻法》等法律，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了平等关系，在家庭形态和家风方面基本上摆脱了旧时的封建家庭制度，形成了新的家风。²⁷⁾在这样的时代情况下，《四世同堂》改编成电视剧的过程中自然反映了当时对家庭制度的思想，因此作品中属于最新世代人的祁瑞全在和钱诗人的对话中批判起大哥瑞宣的“四世同堂的态度”，即传统的封建思想。

可是瑞全这样的批判给观众很突然的感觉。因为前面的整个剧中，瑞宣并没有表现封建的“四世同堂的态度”。瑞宣当然爱护自己的家庭，像祖父爱惜自己的四世同堂，而且父亲祁天佑喜爱家人一样，瑞宣也珍惜祁家四世同堂。可是他这样的对家庭的爱情并不是什么“四世同堂的态度”，更不是应当受到批判的思想。当然，瑞宣有瑞宣的苦闷。抗战一爆发，他因不能放弃家人出走参加抗战而痛苦。后来他慢慢接受了自己和家族的情况，可是他因为为了家庭经济不得不在伪政府统治下工作的情况又感到痛苦。但是他这样的苦闷和封建家庭制度没有任何关系，他的苦闷的原因是敌军占领北平，因此北平人失去主权的战争状况。他的苦闷是作为家庭成员为了维持家庭而发生的，这是基本的家庭伦理，并没有封建专制色彩。瑞全针对瑞宣说的“四世同堂的态度”这句话本身很模糊，剧中也没有明确说明，也没有上下文。这一句话可能是反映了建国以来的时代思想的，可是没有体现出原作的气氛。

可是电视剧中也不是对传统家庭采取完全反对和批判的态度的。剧中还是表现了小说中的那种对传统大家庭的留恋和爱护。可以说，85年版电视剧中批判的是封建家庭制度本身的弊端，而不是某个特定家庭中的问题或缺点。剧中看待祁

27) 可参阅李桂梅：《中国近代以来家庭文化变迁的历程》，《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家的眼光还是带着很深的温情的。剧中对要打破祁家四世同堂的瑞丰夫妻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对在自己所建构的四世同堂将要崩溃的情况下感到遗憾和失望的祁老人表现了同情，并且对为了维持和保护这一家庭而努力的韵梅等人物表示了肯定。

在电视剧中，祁老人、祁天佑、天佑太太和韵梅等人物都为了维持家庭而努力。祁瑞宣的“为了家就为不了国，为了国就为不了家”的心里矛盾也得到了适当的表现。剧中表现祁家大部分成员的家族观念的同时，还强调了他们和瑞丰夫妇之间的对比。为了强调这种对比，剧中添加了一个细节：

祁瑞丰：妈，日本人抓人来了！日本人抓人来了！爷爷，日本人抓人来了，抓人来了！都赖我大哥把小三放跑了！出事了吧？

天佑太太：小二哟！

韵梅：小点儿声儿！

祁瑞丰：那门口全是兵，哪儿哪儿都是！

（外面兵们大声喊）

祁老人：老大呢？

韵梅：他上学校去了。

祁老人：那就好。

胖菊子：他惹的事，他到躲了！

祁老人：哎呀！

妞妞：妈妈！

韵梅：没关系，出了事，我盯着！

胖菊子：你盯得了吗？

祁老人：好了，你们都进屋去吧！

胖菊子：（要跟瑞丰一起进屋，突然说）不行，咱上后院儿！²⁸⁾

瑞宣让瑞全出城以后，因为冠晓荷把前孟石的事情报告给日本人，日本兵来到小羊圈胡同逮捕钱默吟。瑞丰一看到日本兵，就以为他们来祁家抓人，马上责备大哥瑞宣放小三走。听他这么说，祁老人却就一心为家，要保护家里人，可是胖菊子只顾自己和瑞丰的安全，要躲在后院。祁老人要保护家里的每一个人，他

28) 《四世同堂：二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音像出版社，1985年版，第四集。

知道了瑞宣在学校就放了心，可是胖菊子想得特别自私，只责怪瑞宣因放小三走而惹了祸。在这一细节中，瑞丰夫妇的自私和祁家的其他成员的家族观念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虽然瑞丰这么自私，他还是祁家的成员，因此他们夫妇分家后家里的老人们还是希望他们再回来。瑞丰丢了差事后回家想请瑞宣帮忙，剧中在这一细节上也增加了一场对话：

（瑞宣回到家，看到韵梅正在准备酒菜）

祁瑞宣：这是干嘛呀？

韵梅：你猜！

祁瑞宣：哎呀，弄什么酒呀？再说呢，老人在，咱们能背着老人喝酒吗？

韵梅：老爷子发了话，妈亲手炒的菜！让你们哥儿俩好好喝两盅！

祁瑞宣：谁？

韵梅：老二！

祁瑞宣：无聊啊！他这一辈子就够无聊的了！你还让我跟着他一块儿无聊？

祁瑞丰：大哥，回来了？我把科长辞了！

韵梅：这还不该喝两盅？²⁹⁾

在这一场面中韵梅很高兴，准备着酒菜，告诉瑞宣老二辞了职。通过韵梅这样的态度和“老爷子发了话，妈亲手炒的菜”这句话可以看出祁老人、天佑太太和韵梅为了维持家庭而所做出的努力。韵梅虽然知道丈夫觉得老二很无聊，但是她也知道家里的老人们都想念着老二，希望老二回来。在丈夫和老人们的不同态度之间，韵梅向来更赞同老人们的态度，总是替老人们着想。每当瑞宣兄弟和老人们之间发生矛盾时，她都会调解，她知道这是她的责任。她的这种行动也就是她为了维持大家庭而所作出的努力。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在该版本中的政治立场。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衫本达夫先生曾经在他的论著《日中戦期老舎と文藝界統一戦線——大後方の政治の過の中の非政治》一书中从政治角度对于老舍的抗战时期作品进行了分析。关于《四

29) 同上，第十六集。

世同堂》，他对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抗日人士的钱默吟和祁瑞全二人的抗日活动做出了从政治方面的考证。衫本达夫指出，钱默吟和祁瑞全“二人都不是国共任何一方的党员，也不能感觉出他们的政治背景和党派特色。”他说明当时北平城内存在着很多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方的情报员和支持者，老舍也应当知道这样的情况，他不是因为不知道城内的情况而没法正确叙述，而是他故意排斥了任何的政治色彩。他说：“老舍也许认为抵抗的人应该是‘中国的市民’，而不应该是带有党派色彩的人物，不应该有党派的区分，因此他才这样叙述的。笔者认为这是老舍表现了对峻拒党派对立的现实情况的心情的。”然后他分析小说中的钱默吟进行抗日工作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只感到愤怒和憎恨，想一个人去报仇，即个人英雄主义和报复主义时期；第二阶段是认识到了合作的效果，不论党派，跟需要他自己的势力合作，即协力的爱国主义时期；第三阶段是超越出抗日救国的观念，以消灭这场战争本身、追求人类和平为抗日的目的的时期”。他指出这三阶段是投影了老舍自己的经历，即他自从抗战爆发离开济南，怀着愤怒和憎恨的心情参加抗日文艺活动，然后作为“文协”的总务部主任和任何党派势力都进行合作并参加抗日工作，直到超越出党派思想而追求人类和平的理想三个阶段。³⁰⁾

衫本达夫的这些分析是非常妥当和准确的。虽然在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合作并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战初期积极抗日，但是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对战况的看法非常乐观，他们在对抗战的态度上发生了由积极到消极的变化。国民党一方面还是继续抗战，可是一方面他们坚持一党专政、防共限共的基本立场。显然，当时在抗日活动中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党派色彩。可是在《四世同堂》原作小说中的任何人物都不带有任何党派色彩和政治思想。小说中连“国民党”、“共产党”这两个词都几乎没有出现；有一次蓝东阳威胁祁瑞丰说他要吧祁瑞丰的弟弟祁瑞全出城抗日的事情报告给日本人的时候，胖句子反而威胁蓝东阳说：“你说我们老三抗日，我也会说你是共产党啊！”³¹⁾但这并不是显示某一人物

30) 衫本達夫：《日中戰期老舍と文藝界統一戦線——大後方の政治の過の中の非政治》，東京：東方書店，2004年，第224-226頁。

31)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6頁。

的党派色彩，而是当时共产党军队和日本敌军对持的情况下可以发生的很自然的对话。

可是在1985年版电视剧并不这样。剧中的一些知识分子有时候显示出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党派色彩。尤其是祁瑞宣的党派色彩表现得最明显，例如：

（南京陷落，瑞宣一个人在小酒店里流着眼喝酒。在冠家，瑞丰夫妇和李空山跟冠家人一起喝酒，庆祝南京陷落。瑞宣回家，躺下流泪）

韵梅：瑞宣，你怎么了？

祁瑞宣：没事，你去吧！南京丢了！

韵梅：南京？不是说蒋委员长在那儿吗？

祁瑞宣：他们都跑了！

韵梅：那，不就亡国了吗？³²⁾

在小说中，韵梅问瑞宣怎么回事的时候，瑞宣只回答“你去吧！没事！南京丢了！”韵梅“虽然没有像他那么多的知识与爱国心，可是也晓得南京是国都”，她问瑞宣：“那，咱们不是完啦吗？”³³⁾小说中的这一场面上没有表现任何的政治判断和党派意识，可是在85年版电视剧中让韵梅提到“蒋委员长在那儿”，并且让瑞宣回答“他们都跑了”，这样通过他们的对话很明显地表现了瑞宣对国民党政府的深刻的失望。

剧中表现瑞宣对国民党的失望的同时，还表现了他对共产党的肯定与寄托：

（瑞宣上英国府）

祁瑞宣：早上好，富善先生！

富善先生：你好，你好。

祁瑞宣：我们打胜了！您看，报纸上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地说，日本人完成了在长沙的使命，已经依照预定的计划撤出了。这不分明是日本人吃败仗了？

富善先生：瑞宣，我还有更重要，更好的消息告诉你！你看，这才是中国的中流砥柱啊！（给瑞宣看一本书，书上有共产党打仗的照片）是我的

32) 《四世同堂：二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音像出版社，1985年版，第九集。

33)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页。

朋友们拍的！

（照片上有标题：“Mao and the Hat”）

祁瑞宣：富善先生，能不能送给我？

富善先生：送给你？从前给你东西，你从来都不要的！这是……。

祁瑞宣：这次……。

富善先生：哦，我明白了！好，送给你！我再从朋友那里要一本！

祁瑞宣：谢谢您！³⁴⁾

这是中国军队在长沙得到胜利的时候。小说中本来没有瑞宣和富善先生之间的这段对话。这时候日本军队开始在天津和英国军队打仗，富善先生很不安，“他及愿和瑞宣谈一谈。可是他又觉得难以开口。英国是海上的霸王，他不能表示出惧怕日本的意思来。他也不愿对瑞宣表示出，英国应当帮助中国，因为虽然他喜爱中国人，可是也不便因为个人的喜恶而随便乱说。”³⁵⁾这时候战况非常复杂，瑞宣也不便轻易地和富善先生谈话。“他想不清楚，不敢判断什么。……他没法不和富善先生谈一谈心了。可是，富善先生也不是什么哲人，也说不上来世界要变成什么样子。因为惶惑迷茫，老人近来的脾气也不甚好，张口就要吵架。这样，瑞宣只好把话存储在自己心里，不便因找痛快而反和老友拌嘴。”³⁶⁾由此可见，两个人之间没有发生过有关战争的对话，可是电视剧中有意增加了长沙胜利后的这场对话。富善先生特意拿这本书来给瑞宣看，瑞宣看到共产党军队的照片非常兴奋，非常激动，请求富善先生把这本书送给他。像富善先生说的一样，这是瑞宣第一次跟富善先生要点东西的，显然这些照片、这些消息——换句话说，这些军队的存在和他们的活动，对瑞宣来说具有极大的意义的。而且电视剧中的照片上有意添加了“Mao and the Hat”这样的标题，明示了最积极抗日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并强调了他们就是“中国的中流砥柱”。

虽然老舍在原作小说中没有表现任何人物的政治立场和党派特色，可是当时

34) 《四世同堂：二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音像出版社，1985年版，第十七集。

35)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2页。

36) 同上，第746页。

抗日战争的最主要的力量就是共产党军队，这是很明确的事实。85年版电视剧在这样的史事的基础上增加了剧中一些人物对当时政治情况的认识和判断，并让这些人物表现出当时存在的两个不同党派的想法和态度。而且这一版本发表的是解放后，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政治思想方面的表现和原作发表的当时相比，可以更加自由一些，大胆一些。85年版电视剧中将播放当时的这种社会气氛和抗战当时的史事相结合，适当地表现了沦陷当时北平人民对一方的失望和愤怒以及对另一方的希望和寄托。

5. 结论

上面分析了1985年版电视剧对《四世同堂》原作小说的改编，并思考了改编当时的时代思想和社会气氛对这些改编的影响。在电视剧中有意加强每一个人物的国家民族意识，这样的改编反映了八十年代改编当时的复杂的中日关系以及文革刚结束后中华民族在世界中寻找其民族主体性的过程。电视剧中对瑞宣和韵梅的夫妻关系的表现和原作小说不同，增加了他们夫妻之间的对话，加强了和睦的气氛，这是因为文革之后整个社会对知识分子阶级的看法和评价上发生了变化，因此改编过程中尽量要纠正知识分子婚姻生活中的毛病的结果。电视剧中对中国传统家庭制度也表现了与原作小说不同的看法，这是反应了八十年代发布《宪法》、《婚姻法》等法律后家庭气氛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上发生了变化，由此产生的对传统家庭制度的批判性看法的。电视剧中反映了改编当时的整治情况，剧中表现了一些人物的政治思想与党派色彩，主要是表现了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失望和对共产党军队的希望。

老舍的《四世同堂》中存在着唯一的大命题：抗战。他发表《四世同堂》的四十年代中期到五十年代初期，整个中华民族为了抵抗敌人而团结了。当时敌对中华民族的势力非常实在，作品的中心思想集中在爱国主义上，因此在其他社会

思想方面处理得比较简单。但是对原作进行改编的八十年代显然和抗战当时不同。抗战结束已经过了三十多年了，这三十年中中华民族经历了很多大事件——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等等。当时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上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而且出现了很多新的思想。1985年版电视剧《四世同堂》在改编过程中以原作的主题和中心思想——抗战和爱国主义精神——为基础，敏锐地判断了当时观众们的口味和要求，反映了八十年代中期当时的时代气氛，涉及到了当时的一些新的社会思想。改编过程中的这样的企图将电视剧内容完成得更加丰富多样。虽然有些部分的改编没有正确地体现原作的意图，可是这些内容还是具有时代上的妥当性。因此，1985年版电视剧《四世同堂》可以评价为在《四世同堂》改编史上具有很大意义的版本。

< 参考文献 >

- 老舍：《老舍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 老舍：《老舍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 《四世同堂：二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音像出版社，1985年版。
- 曾广灿、吴怀斌：《老舍研究资料》上、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
- 胡絮青、舒乙：《散记老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
- 张钟：《老舍研究》，澳门：澳门大学图书馆出版中心，1995年。
- 京莹：《患难情缘：老舍与胡絮青》，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
- 舒乙：《我的父亲老舍》，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
- 杉本達夫：《日中戦期老舍と文藝界統一戦線——大後方の政治の過の中の非政治》，東京：東方書店，2004年。
- 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上、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 赵园：《北京：城与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 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 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 段从学：《“文协”与抗战时期文艺运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 郭镇之：《中外广播电视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 刘燕芳：《论老舍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重庆大学大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 戴四春：《论中国家族电视剧的审美与文化表征》，福建师范大学大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 赵朝贵：《论瑞宣》，《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 宋瑞祥：《民族气节古今谈》，《中州学刊》1985年第3期。
- 李琪、赵明：《谈谈〈四世同堂〉对民族性格两重性的剖析》，《上海党校学报》，1985年第8期。
- 鲁丹：《从宣传〈四世同堂〉想到的》，《新闻业务》，1985年第11期。
- 何云蛟：《立足本土走我国自己影视音乐之路——评〈四世同堂〉音乐创作兼论当前影视音乐》，《人民音乐》，1985年第11期。
- 贾云：《电视剧〈四世同堂〉的启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1985年第11期。
- 蓝翎：《民族灵魂大动荡的纪念碑——看电视剧〈四世同堂〉的札记》，《中外电视》，1986年第1期。
- 绍武、会林：《论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 赵正品：《〈四世同堂〉播出的前前后后》，《中国广播电视年鉴》，1986年。
- 陶理清、杨克棋：《八十年代思想历程的回顾与启示》，《安徽农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 李桂梅：《中国近代以来家庭文化变迁的历程》，《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 曹书文：《旧家的解体与灵魂的归依——抗战时期家族文学新论》，《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 陈明远：《“文人”和“文化人”的起源》，《北京观察》，2002年第9期。
- 陈天宇：《邓小平爱国主义思想初探》，《附件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 过渊弘：《传统文化与知识分子——从〈四世同堂〉的三类知识分子形象看老舍的文化选择》，《语文学刊》2008年第2期。
- 孟宪范：《家庭：百年来的三次冲击及我们的选择》，《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 陈刚：《论气节——中华气节管的意蕴、内涵与作用》，《学海》2009年第1期。
- 陈毅清：《老舍忠孝观的文化阐释——以〈四世同堂〉中祁家三兄弟的形象为例》，《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 宋志勇：《从敌对关系到战略互惠的中日关系》，《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董振瑞：《“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邓小平与1977-1989年的中日关系》，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2012年。

< 국문제요 >

《四世同堂》은 老舍가 항일전쟁 시기에 창작을 시작하여 종전 후 미국에서 생활하던 당시에 완성한 장편 대작 소설이다. 《四世同堂》은 발표된 후 현재까지 이미 네 번에 걸쳐 개작되었는데, 그 중 첫 번째가 1985년에 장편 TV 드라마로 개작된 것이다. 이 1985년판 드라마는 원작의 내용에 매우 충실하여 원작의 정신을 잘 구현했으며, 동시에 소설 속의 “小羊圈胡同”을 생동감 있게 재현해 내어, 아직까지도 《四世同堂》 개작 사상 가장 권위 있는 고전으로 평가되고 있다.

1985년판 드라마는 개작 과정 중에 원작의 전개와 주요 내용을 표현하는 동시에 몇몇 부분에 있어서는 변화를 시도했다. 이러한 변화는 세 부분에 걸쳐 드러나는데, 첫 번째는 등장인물들의 국가 민족 의식을 의도적으로 강조한 점이고, 두 번째는 당시 지식 분자의 결혼 생활 문제에 관한 내용이며, 세 번째는 전통 가족 제도와 정치 상황에 대한 원작과 다른 시각이다. 1985년판 드라마에 나타난 이러한 변화는 개작 당시(80년대 중반)의 사회 사상 및 분위기를 반영한 결과라 볼 수 있을 것이다. 본고에서는 이 세 가지 부분이 드라마 속에서 구체적으로 어떻게 표현되었으며, 또한 이러한 변화의 배후에 어떠한 시대적 요소가 작용하였는지 분석해 보려 한다.

주제어: 《四世同堂》, 老舍, TV 드라마, 개작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14. 3. 31.	2014. 4. 28.	2014. 5. 9.	2014. 5. 24.	2014. 5. 31.